

中国古、近、现代历史上的派系斗争

杭州养正学校 801 班 杨哲

中国历史上的派系斗争又称“党争”，这些斗争绝大多数都没有正义和邪恶之分，所谓的“党”也非民主政治环境下的党派，而是由于或个人恩怨、或客观条件结成的利益集团，属于危害人才选拔公平性的官僚团体。

本文将通过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派系斗争案例，分析古代政治体制下派系、官僚集团形成的原因，追求利益的运作方式，以及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

本文分析的案例均处于古、近、现代历史时期，即 1949 年之前。

最早的一个案例是秦朝胡亥、赵高、李斯派系与扶苏、蒙毅、蒙恬派系的争斗。赵高、李斯是秦朝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奠基人，胡亥是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蒙毅、蒙恬是秦朝帝国军事力量的主要领导者，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依照宗法制，皇位应由扶苏继承，但扶苏在政见上与秦始皇不合，反对秦始皇过于彻底的集权，因此被秦始皇派到北陲督军。秦始皇在沙丘驾崩后，随行的赵高、李斯串通一气，掩盖始皇死讯，并伪造诏书令扶苏、二蒙等人自尽，拥立胡亥即位。在这场派系斗争中，赵、李、胡派系形成的原因是始皇时代共同的利益追求和道德品质的败坏，而扶苏、二蒙派系形成的原因则是被逼的，由对秦始皇残暴统治政策的不赞成和对穷兵黩武国策的怀疑而起。赵、李、胡集团为达成胡亥上位、赵李把持朝政的篡位目标，故意隐藏始皇死讯，伪造皇帝诏令，并迫害长子扶苏、边防将领二蒙，手段极其卑劣，应承担秦朝灭亡的主要责任。扶苏、二蒙派系的形成已为不得已，属于被迫害者，不能和前一个派系相提并论，但是三人接到伪造的诏书后不辨真假、毅然自尽，体现出他们的盲目忠君、轻信他人，在政治洞察力上的缺失也是他们悲惨结局的成因之一。从这个角度上看，三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秦朝的这次派系斗争导致赵高、李斯把持了朝政大权，胡亥即位，继续秦始皇的残暴统治，不久就激起了各地的农民起义，最终导致了秦朝政权的覆灭，可谓自食其果。**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奸臣派系对贤臣派系的斗争往往运用卑劣的手段取得胜利，贤臣、忠臣难以运用正当方式维护自身权益，结局悲惨。**

随后看到西汉，盐铁会议中桑弘羊与霍光、“贤良文学”的派系争斗。公元前 82 年左右，主持朝政的霍光在全国范围内举“贤良”“文学”等儒士至京城，讨论盐铁官营政策的改变问题，而桑弘羊时任御史大夫，在国家经济政策方面有较高的地位。此前汉武帝好大喜功，想要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采取盐铁专营的办法控制两种重要商品的税收，该举动填补了大规模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但也使大批商贾流离失所，百姓怨声载道。汉昭帝即位后，认识到穷兵黩武的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危害，意图恢复文景时期“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地位，便授意霍光组织该次会议。由于霍光把持朝政，儒士阶层人数众多，霍光一方最终获得会议的主动权，并宣布部分废除盐铁官营政策。桑弘羊自武帝朝从政，一直以自己的盐铁官营、算缗告缗等集中性经济政策为傲，此时突然遭受打击，心有不甘，遂图谋使用阴暗的手段除掉霍光。公元前 80 年，桑弘羊、上官桀等人设宴谋杀霍光，计划失败，参与计划的大臣均被灭族。客观而言，两派形成之初都是为了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着想，并无对错之分，但会议召开后失去舆论领导权的桑弘羊一方意图用谋杀的卑劣手段削弱霍光一方的势力，就应受到道义的谴责，而居于斗争的被动地位。原本召开盐铁会议的方式是公平公正的，而谋杀等政治手段则纯粹出于个人恩怨和政治利益诉求，

为人所不齿。这场斗争的结局是桑弘羊一方全体灭族，霍光在朝中的权力更大了，西汉王朝消灭了一股危害统治稳定的力量，恢复了“还富于民”的合理政策，但也导致了霍光家族专权情况的发生。由于政见不同分化出的有一定政治背景的派系，既有可能用正当手段解决争端，也有可能以卑劣手段互相迫害，最终一方获胜、一方惨败。

第三个案例是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东汉后期宦官把持朝政的现象严重，因此一部分品德高尚的士大夫上书要求削弱宦官的权力，恢复正常的朝政秩序。然而宦官集团利用自己对皇权的控制力，在 166 年、169 年前后两次以“党人”的名义禁锢这些士人的政治活动，规定他们永远不得入仕，用卑劣的手段对传统儒学阶级进行大规模的迫害。在这场派系斗争中，大批文臣武将将被排挤出朝堂之外，东汉统治阶级丧失了最重要的维系有效统治的力量，最终既无法抵御外族，也无法平息内乱，走上了衰亡的不归路。士人们因为自己的政治追求、宦官们因为自己的共同利益，各自自动形成了两个国家级的庞大集团，士人一方使用透明的方式，上书劝谏；而宦官们使用急速膨胀的权力，大肆迫害国家的栋梁及牵连者，丝毫不考虑国家的存亡，只为私人恩怨就露出最狰狞的面目。两次“党锢之祸”结束后，东汉王朝内部起义风起云涌，广大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颇为失望，无人收拾残局，最终导致了东汉王朝的灭亡。在皇帝昏庸的情况下，即使在全国的范围内，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一派反抗少数专权者，也注定以失败告终。

唐朝的党争颇为著名，既是因为激烈程度之高，又是因为牵涉人员数量之多。总体来说，唐的党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唐玄宗在位时期，三位宰相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的争斗。张九龄是典型的贤相，正直清廉，关心民间疾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唐玄宗对外扩张的军事政策，重振姚崇、宋璟为相期间的清明政治风气，时在公元 734 年左右。李林甫则是典型的小人，“口蜜腹剑”最初就是形容他的，不学无术，在军事、政治上均无特殊才能，却因为善于谄媚被统治后期的唐玄宗赏识，从而入朝为相。736 年是二人同时为相的一年，张九龄很忌惮李林甫的低贱作风，李林甫也把张九龄当作自己篡权路上的最大阻碍。因此，李林甫在唐玄宗面前屡次献谗言，使唐玄宗逐渐丧失了对张九龄的信任，最后导致张九龄罢相，郁郁而终。李林甫此时看似可以独掌大权，同时边防将领安禄山也讨好李林甫，兵权日益膨胀，然而杨贵妃的亲属杨国忠由于玄宗对贵妃的宠幸而平步青云，同样入朝为相。杨国忠虽然政治才能不高，但也洞察到安禄山迟早要谋反，多次提醒玄宗，自然被李林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两人都是奸臣，所以他们的斗争一直不分上下，唐玄宗愈发昏庸，无暇掌管此事，客观上给了安禄山准备叛乱的时间。这次派系斗争没有此前几次的残暴，双方基本都运行在正常的吏治轨道内扩张自己的势力，带来的影响却无法抹平——唐朝由盛转衰，天宝年间的党争要负一份责任。晚唐的牛李党争则纯粹是由门第区分而起，个人恩怨席卷了整个朝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得势一党把持朝政、失势一党下放地方已成为惯例，是几个不释前嫌的官员为了一己之利而阻挠政府的正常工作，导致形势大好的削藩等行动最终失败，也激化了社会矛盾，是唐朝后期多次农民起义和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君子派系与小人派系斗争，小人派系内部出现分化，或两个派系纯粹为个人利益斗争，都有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鲜明的人物形象之一或许就是岳飞了。岳飞正是南宋初年主战派的代表之一，而主和派的代表则是秦桧。终南宋一世，主和派的大臣始终占优势地位，与南宋的军事实力和外部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冷静地分析，主战派的大臣并非都是爱国忠君的模范，他们之中无能甚至奸猾的也有不少；发动的北伐除了几次取得明显胜利的，大多损耗了南宋的国力，削弱了宝贵的国防力量，并不值得大加传颂。反之，主和派中也并不都是秦桧、贾似道之辈，有一部分大臣确实是为国家更好的发展着想。不能总是认为思想更为激进、观点更为新颖的一派就是正义一方，也不能认为主张维持现状的一派就一定是贪生怕死。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的过程中，大多是上书劝谏、建议发动北伐等方式进行，鲜有对个人的迫害，这体现了宋朝对士大夫的尊重，同时也映衬出这次派系斗争并不是个人利益的斗争，而是国家政策的激烈商讨。南宋先后发动了几次北伐，如“开禧北伐”等，虽然没有取得胜利，却在挫败中认清了形势，破灭了激进主战派恢复中原的幻想，也能及时了解北方各大势力的变化情况，有时还能提升南宋在宋金和议中的地位。这次派系斗争的结局是南宋成功防御了金朝的军事进攻达百年之久、蒙古的军事进攻达四十年之久，进一步发展了江南地区的经济。**运用正当手段，出于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的目的进行的派系斗争，一般都有较好的结果。**

本文要讨论的最后一次派系斗争就是晚明的东林党、阉党和各地方派系之争。阉党是经常在乱世把持朝政的宦官；东林党是江南士大夫为主形成的“清议”派政治团体，主张政治清明、关心国事、积极防御后金政权、破除形式主义积弊等，其创立的初心是为国为民；各地方派系有浙派、昆派、楚派等，是由于明朝人对乡谊的注重而产生的，没有实质上的意识形态、政治主张的区别，而仅仅是一个利益团体。初期主要是东林党与各地方派系的斗争，其中浙派先后有人成为内阁首辅，因此权力较大，但各地方派系之间内部矛盾严重，且没有任何一派的权力大到控制舆论的地步，因此各方维持大体均势。斗争的手段以舆论谴责、正常吏治手段为主，偶尔也出现较为卑劣的行为。后期主要是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此时前线战况如火如荼，明朝灭国危险在即，阉党却为了报复东林党人此前对舆论的控制，把持朝政并大肆迫害东林党人，延误了前线的战机，削弱了明朝的国防力量。崇祯二年东林党再度掌权，但以报效国家为初衷的他们却没有众志成城抗击外敌，而是对阉党进行报复，虽然阉党罪有应得，东林党人此举也体现了他们不以大局为重、心胸狭窄的官僚阶级本质，再度使抗清战局恶化，明朝的最终灭亡与他们执意报复宦官集团有很大关系。**君子派系对小人派系斗争一旦取得胜利，所使用的手段往往也变得卑劣，鲜有以大局为重的真君子。**

历史上还有很多其他派系斗争，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时鲜卑派和汉化派的斗争、北宋的新旧法派之争、晚清的维新派和立宪派之争、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等等，但性质和本文提到的几次都类似，故不作赘述。总结出的规律：

- (1) 派系分化是派系斗争的基本原因；
- (2) 派系斗争主要由个人利益争端、政治主张分歧两类因素造成，后者造成的斗争往往有相对较好的结局；
- (3) 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使用卑劣手段的一方在斗争中具有先天性的优势，形成的派系也不是今天的党派，而是利益集团。